

赵衡文集

二十世纪中国人去西方，西方人来中国，看到什么，学到什么。这是一本历史的胡涂乱抹。

• 对岸的诱惑

中西文化交流记

The Lure of the
Other Shore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海出版社

衡文集

• 对岸的诱惑

中西文化交流记

The Lure of the
Other Shore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岸的诱惑：中西文化交流记 / 赵毅衡著. —成都：
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13.3

(赵毅衡文集)

ISBN 978-7-5411-3680-1

I. ①对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名人一生平事迹—世界
—20世纪 IV. ①K81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081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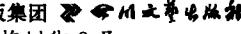


DUIAN DE YOUSHUO

对岸的诱惑：中西文化交流记

赵毅衡 著

责任编辑 贺树
特约编辑 任伟
责任校对 贺树
责任印制 唐茵等
封面设计 任熙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
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址 www.scwys.com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50mm×230mm 1/16
印 张 16.25
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680-1
定 价 30.00 元

自序

这本薄薄的书，写了二十多年，从1978年允许我按自己的兴趣读书开始，一直到今天。当然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，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——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。从马齿徒长到满鬓苍然，多少“事业”不过是人生的规定动作，得分失分都不会太意外。人生悲哀莫过此：动作做完，鞠躬下台，回想起来，只有一两个过门动作，允许别出心裁。

这本书不然。这是我想写的书，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，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，既不能靠此争工资升级，又不能作学术会议发言，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。一句话，这是纯为爱好而写，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乱涂下的游戏文字，但是又积习难改，好玩之中，想说出点意思。

本书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人物——西方人来中国，中国人到西方，看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些什么。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，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，例如萨特神游“文化革命”的中国。

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，人头攒动，狂潮汹涌。这次的大规模集体舞，每年来回的人数，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，其历史印痕，至今不太清晰。因此，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，暂时就不给当代“交流人物”每人一篇的待遇。

本书写到的人，绝大部分已经辞世。留下一辈子是非，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。

20世纪，中国人到西方，是去做学生的，徐志摩去做曼殊菲尔的学生，金岳霖、张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学生，吴宓、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学生，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学生。大部分人是望门弟子，严复没有做成赫胥黎的学生，李劫人没有做成左拉的学生，李金发没有做成波德莱尔的学生，邵洵美没能做成王尔德的学生，只是伦敦和巴黎的空气中，全是这些人的遗踪神韵。至今中国人来西方，大半还是当学生。像我这样教书的，只是教师不是老师。

西方人到中国，是来做老师的：庄士敦来做溥仪的老师，燕卜荪给西南联大做老师，杜威罗素萧伯纳来给整个中国知识界当老师，瑞恰慈几乎要给全体讲汉语的人做老师，1951年，最后一位硬想留下来的老师燕卜荪被赶走，换上俄国人做老师。我个人认为，有师无类，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。最好是师出多门，三人行必有吾师；只要不做一边倒的“好学生”，不必句句当真理就是了。瞧着把俄国老师也赶走了，天下事益发不可为。

一教一学，教的什么学的什么？是近代西方特产，20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，即是“现代性”。中国的现代意识，可以说是“学得性现代意识”，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。吾友王宏图谓：“中国文化传统资源，不敷以支持现代化。”我的看法是，中国传统从从来不是用来支持现代化的，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。不过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陷。张之洞挑起的体用之争，李约瑟发起的中国固有现代性源头之寻，都是无事生非，自己找事。

现代性及其“进步”观念，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，其他文化都缺乏这种前行性。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，学习就是；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，继承就是。何必在优劣高下上纠缠一二个世纪，趋长避短见机而作，“何必曰面子”？

日本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，中国五四一代，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回顾徐志摩、许地山、闻一多、老舍、刘半农，他们留学时，都遇到这个面子问题，他们的对付方式，各有千秋，似乎都不像有愧于“民族大节”。就这一点，我们都有必要怀念五四那一

代留学生。

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，需要好好向东方学习。他们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贤。感觉到西方文明存在问题，也就是觉悟到现代性并非万灵妙丹，“进步”并不无穷尽地给人类带来好处。这部分西方思想家，不少引用中国作为“理想文明”的榜样——古代中国，尤其是道家，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；以及当代中国，尤其是“文化革命”中的中国，几乎是“另类文明”的地上天堂。

对于这一类中国崇拜者来说，最大的危险，是到中国亲历一番：本书第三部分“梦游者”中，有几位短暂到过中国，却没有多说。一点不奇怪，他们对所见所闻宁愿保持沉默，不想改变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神话。还有些更聪明的中国迷如庞德，如韦利，干脆一辈子不到中国来，遥遥保持“崇拜距离”。

“梦游”西方的中国人？就免了。可以说，绝大部分现代中国文化人，如果想向西方学点东西，千方百计到西方走一遭，不会惊破好梦。除了一次大战之后的西欧荒芜残破，曾使梁启超不胜惊悚，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现实吓一跳的。极而言之，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界，从极左到极右，都醉心于这种那种西方思想，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，就是朝西的“梦游记”。有几个人，能在扫描范围之外？

我能想起的几个例外中，有俞平伯，北大《新潮社》健将，1920年与傅斯年共赴英伦，慨然有尽收西学之志。不料在英国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就打道回府。后来在自述中说“金镑涨价，自费筹划尚有未周”。傅斯年回忆录说是这位好友“思家心切”，加上气斯面包难于下咽。俞出身苏州名门，同光朝大儒俞曲园脉裔，从小就延请家教学英文，“筹划”七八年竟然“未周”到一出国门就精神颓唐，终身厌听“西方”二字。然而俞平伯一生，努力将西方“科学式”批评用于红学，50年代被批判为胡适学派第一人。或功或过，能归于一个月的留学？

还有另一个例外：辜鸿铭。此公出生于南洋，在英国留学十年，20岁才踏上中国土地，竟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拥护者。中

文虽然错字连篇，却用典雅的英文宣扬中国文明，而且身体力行，主张男人应留辫纳妾，女人应缠脚吸鸦片。很多人说辜老只是喜欢逆反，作秀而已，他实际上一半西人血统。这倒解释了一切：辜鸿铭要留着中国不变，以便为西方文明补缺。如果我像辜鸿铭一样好走极端，我就说此老是个汉奸。

应当诚实说明，这不是一本成体系的书：中西文化交流史，是个严肃工作，我只是弄些奇闻逸事，茶余谈资。哪怕写人物，也远远说不上全面。我没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些最重量级人物：去西方者，我没有说严复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汤用彤、钱锺书；来中国者，我不去碰杜威、罗素、马尔罗、司徒雷登、李约瑟、斯坦因、克莉斯泰娃；梦游者，我敬而远之布莱希特、海德格尔、德里达、福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，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，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。这些人物都需要专门研究者来处理，不然很可能胡说一通。

特级人物中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庞德。这是因为 I 从 80 年代初就研读庞德，算是对其人其事有点心得吧。

第二应当说明的是，我有意略过了西方所有的汉学家，同样也不谈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家，因为他们对对岸的兴趣，是职业性的。他们的贡献自然极大，没有他们，文化交流就会在 19 世纪的皮毛上打圈子。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础，不是对异国文化的知识，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卓见——真正起作用的，必须是误读，而有意义的误读，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跳出新舞步的人物，必然是“业余”舞者。

最后应当说清的是：此书中我个人的“研究成果”不多，大部分都是读各种中英文资料，有所感想。感想本是极廉价，这个世界上只嫌太多。而“切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”，却是做专家的首要条件。我读到的资料，都是专家们扎实工作几十年的成果。我不可能为此书中写到的近 50 位人物，都做一番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努力，那样这本书需要至少 500 年才能完成。

依学术规范，我应当密密加注，说明资料来自何人的功绩。但是这些小文，毕竟只是轻松读物，加注只能让非专家读者厌烦。我在文中尽可能说明资料的来源，尤其当这个源来得有意思的时候。

我唯一可以辩解的是，传记材料虽然来自他人，我却设法给每个写到的人，找一个有意思的，或许国别文学史专业研究者没有看到的角度。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写了二十多年：传记多矣，并非读几本，就能凑一篇：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，二十几年来也就只遇到这些。

扩编新版按言

这本书是多年前出版的，五年前又再版了一次，书店售罄，读者又需要，只消重印，本不必出新版。

但是此书有点不同，我在原序中已经说了，平日随便读书，看到好题材赶快追踪跟读，所以书不厚，写了二十几年。日积月累，渐渐摞成一本。原书出版后，读书未停，到图书馆翻阅的旧习未消退，几年中自然而然又积累了一批。于是撤出原书中与我的其他书重复的篇目，加上十多篇新篇目，就有了这个版本。

原书出版，只当了一件自家心事，为二十几年的乱读书做个盘点。不料各方面反应，出乎意料。

首先是不少文友来谈逸事，有点像现在博客的“跟帖”。来信补充的，质疑的，反驳的，互联网上遥应一下的，甚至有远道来找我商榷的。一人读不如众人读，我把各人的跟帖记下，在此版中作了补记、修改。如果历史能这样靠大家累积写成，岂不太妙？

另一个没有料到的是，不少大学老师用此书作“教辅”，研究生写论文用作出处，评审教授往往来问我学术根据何在，一开始就只是当作自我消遣来写，材料没有详尽注明，论事没有说各方观点。我只能打着哈哈说“心外无物”。

我在此特地说明一下：书中说的，都有根据。只不过已经写成游戏文字，就不想重做高头讲章了。只能说：这本书可能无心对上了有意，击中了现代文学文化史的一些紧要空白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此书或许能提示有心者：有些好题目一直被忽略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自 序 | (1) |
| 扩编新版按言 | (6) |
| 第一部分 西游记 (1) | |
| 徐志摩：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 | (2) |
| 求博还是求精：傅斯年的例子 | (8) |
| 留学民族主义：朱湘的留美之怒 | (12) |
| 许地山留学：如何对待自己的“留学爱国主义” | (17) |
| 闻一多与美国“死水” | (20) |
| 《虹》后之《霞》：“时代女性”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 | (25) |
| 拼命精神，打油风趣：刘半农之留学 | (34) |
| 穆旦：下过地狱的诗人 | (39) |
| 李金发：不会写作，才会写诗 | (44) |
| 留学而断送前程的康白情 | (50) |
| 老舍：伦敦逼成的作家 | (54) |
| 邵洵美：中国最后一位唯美主义者 | (59) |
| 蒋希曾：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华人作家 | (62) |
| 组织成的距离：卞之琳与欧洲文学家的交往 | (71) |
|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 | (77) |
| 胡愈之与世界语乌托邦 | (83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 | (88) |
| 萧乾：永远的少年 | (95) |
| 这个哑巴太会说：英语散文家蒋彝 | (98) |
| 郭嵩焘：西方官司中国打法 | (102) |
| | |
| 第二部分 东游记 | (107) |
| 庄士敦：我的老同事 | (108) |
| 朱利安与凌叔华 | (114) |
| 艾克敦：胡同里的贵族 | (120) |
| 瑞恰慈：漫游镜中的阿丽丝 | (124) |
| 燕卜荪：某种复杂意义 | (128) |
| 蒙罗：“在中国色彩中得到安宁” | (135) |
| 韩约翰写萨凡奇 | (139) |
| 高罗佩的一个世纪，狄仁杰的一个甲子 | (142) |
| 奥尼尔：道家救赎华尔街 | (151) |
| 狄金森：顶戴花翎的剑桥院长 | (155) |
| 毛姆与华侨持枪女侠 | (159) |
| 宾纳：弄假成真的“中国式诗人” | (163) |
| 奥登：走出战地的诗人 | (166) |
| 金斯堡的 100 个问题 | (170) |
| | |
| 第三部分 梦游记 | (173) |
| 芳香而危险的爱情：凯瑟有所思 | (174) |
| 斯奈德：儒佛道社会主义者 | (179) |
| 弗赖：在文明的另一极 | (183) |
| 鄂狄叶：从《玉书》到《大地之歌》 | (187) |
| 韦利，书呆子艺术家 | (190) |
| 罗厄尔：“女罗斯福”拆字 | (19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杰弗斯：逍遥游的悲观主义之鹰 | (199) |
| 凯喆安的“机变诗” | (206) |
| 为庞德/费诺罗萨奇文一辩 | (211) |
| “一字儒”庞德 | (217) |
| | |
| 第四部分 游之余 | (231) |
| 我们还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吗? | |
| 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一 | (232) |
| 中国留学生，你写不写中国题目? | |
| 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二 | (236) |
| 海外学者有优势吗? | |
| ——留学史笔记之三 | (242) |
| 听谁讲说异乡事? | |
| ——留学史笔记之四 | (244) |

第一部分 / 西游记

徐志摩：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

标题听来调侃，却是出于由衷的钦佩：现代中国文人，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，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。

曾有 BBC 电台记者采访我，问寓居西方的中国文化人，如何才能融入西方文化。我干脆地告诉他：完全不可能。除非你嫁入娶进洋人家庭，有人步步指引，事事点拨；否则，就等着在这里成长的下一代吧。各种谈得热闹的种族肤色上的心理问题，是已经进入这个社会之后的事。对我们这些成年后来到西方的人，连受冷落的心理痛苦都谈不上：除了工作中不得不应付的人事关系，我们没有精力深入这个文化，泡酒吧，坐咖啡馆，逛派对，步山原，钓急溪，没有时间补课来熟悉并崇拜各种运动的英雄，各种娱乐的明星：我们面临的是不可能跨越的文化之沟，我们几乎不可能与同行之外西方人做朋友。

近来读了一些徐志摩，才觉得自己的断言恐怕应当修正：如果你愿意像徐志摩那样不惜代价地追求，而且有他那样的魅力和才气，恐怕真可以“进入”洋人社会。首先可举的例子，当然是徐志摩见曼殊菲尔这桩文坛佳话：费时多日，反复去信求见一面，先与曼殊菲尔的实际丈夫墨雷大谈了一次俄国文学（曼本人最爱契诃夫）。得到邀请，冒雨找去。入屋后万分激动，却不料曼殊菲尔因病不见客。徐忽见有客从楼上走下，于是乘机再陈述要求，回话才是：“可以上楼去见她。”

据徐志摩自己说，前后不过 20 分钟，徐志摩却当作平生最宝贵

的记忆，回忆纪念一辈子从未稍息。

换一个人，你我之类的俗人，早就觉得受了无礼怠慢，一走了之，所以我们从无徐志摩的好运。徐志摩一见“仙姿”，马上“一阵模糊”，“头晕目眩”，“像受了催眠似的，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”。“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，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……只觉得可感不可说的美，你仿佛直接无碍地领会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。”

当然，诗人对美特别敏感。但是谁能像徐志摩，之后多年，还在不厌其烦地写“二十分钟不死的敏感”：“粹极的灵彻性”，“她，是使我使用上帝给我那把进天国的秘匙的”，“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身震荡？”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想象徐志摩神经的易感性。

从我所找到的大量照片画像来看，曼殊菲尔无论用什么标准，都算不上美人，但徐志摩让我们信服她的天姿国色。而且没有人能去测定徐是否言过其实，因为曼殊菲尔第二年即去世。为此，徐志摩曾到巴黎她的坟上哭吊，并有诗祭之。

我这么一说，好像徐志摩在炮制美丽才女神话？是如此，又并非如此。徐志摩结交名人的本领，可能盖世无双：1921年徐到英国时，是个24岁的青年学生，尚未想到写作，只是个文学爱好者，政治、经济，哪一门都念得半不拉儿。结交的却是大作家威尔斯、康拉德，著名批评家墨雷，桂冠诗人布里基思，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，最重要的美学家弗赖，而当时知识界的领袖狄金森竟成了徐的保护人。请问，20世纪中国文人有谁交往有如此之广，恐怕只有萧乾等二战期间在英的人可能有此缘分，那大半是拜“同一战壕”情结之福。

当然，徐志摩本人翩翩佳公子，说得一口好英语，中西文学都读得多。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中国诗翻译家韦利曾多次向这个小青年请教唐诗，你能想象当今哪位汉学大家向一个中国留学生请教？

家境富裕也是原因之一。不过徐志摩出手之大方，也让人惊异。请看徐带给曼殊菲尔的见面礼：赵之谦草书、王觉斯草书、梁山舟

行书……徐志摩拜见西欧文豪的确有股热切劲儿——而且每见必有文记之——当时创造社讽刺他“拜祖宗”，鲁迅讪笑只有大文豪才有资格哭洋女坟。徐志摩有个好处：对此类嘲弄不睬不理，我行我素。

1925年欧游时，公布日程似的说：我去为了泰戈尔，顺便我想多瞻仰几个英雄。我想见法国的罗曼·罗兰，意大利的丹农雪乌，英国的哈代。哈代见着了：八十多岁糟老头，当然没有曼殊菲尔的“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”。徐志摩的描写很刻薄：“怜这条倦极了通体透明的老蚕，在暗屋子内茧山麦柴的空缝里，昂着他的皱褶的脑袋前仰后翻地想睡偏不得睡。”徐志摩远道奔至多赛特郡，哈代拒绝题词，拒绝拍照，“啬刻的老头，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”。徐请求一点纪念品，哈代从花园里摘给他几朵花！如果说，好见名人未免有点矫情，但徐志摩对已死者一样景仰，欧游还有谒墓的报告：在莫斯科上契诃夫、克鲁泡德金的坟，在枫丹白露上曼殊菲尔的坟，在巴黎上茶花女、哈哀内的坟，上波特莱尔的坟，上伏尔泰、卢梭、雨果的坟，在罗马上雪莱、济慈的坟，在翡冷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……名单太长，不抄了，连徐本人都自嘲他在“上清明”。

因此我有理由怀疑，徐志摩赞美剑桥，是他为自己制造神话。

1920年9月，对美国失望后来到英国（纽约当时世界级文化名人的的确没有伦敦多），秋天见到17岁的林徽因，一见钟情，神魂颠倒。这场单相思为时极短，速战速败。冬天，林去苏格兰上学，不久后随父回国。而徐志摩致信家中，“盼媳出来”。于是，妻子张幼仪携子来伦敦。徐志摩虽说是在伦敦社交界大成功，他却决定去剑桥。为此，还走了狄金森的后门。

1921年春，徐志摩到剑桥国王学院，没有专修，是个随意选择听讲的特别生。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课，而住处竟然离剑桥6英里（近20里）！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“谁都不认识”，连同学都没一个。而与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。难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夏，徐志摩却说“英国几乎没有夏天的”。该年冬天，林徽因回国，而徐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，次年3月，他在柏林

离婚，一个人回到剑桥。

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，徐志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。1922年3月归英，忽然发现“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”。他开始写诗了，中国有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。奇迹是怎么发生的？因为在“四五月间”剑桥的“春天是更荒谬的可爱”。春天可爱依然，对事事失败的徐志摩，却是荒谬。这是他“慢慢发现”的。发现了什么？徐的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一文，完全在描写乡野景色，附加描写了剑河上的古桥，完全没有说到文化学术。细读一下，就明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，与你我各位在国外发现的完全一样：孤独。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意：“‘单独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……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，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。你要发现一个地方，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……啊，那些清晨，那些黄昏，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！绝对的单独。”

徐志摩写到散步，单独；写到骑自行车游荒郊，单独；划船屡学不会，也没个英国朋友教，只能呆呆看着矫健的女学生划船，单独。“那闲暇，那轻盈，真是值得歌咏的。”我不相信他心里此时没有一点酸劲儿。个人生活的剧变，恋爱的不幸，应当使一个敏感的诗人痛苦欲绝，尤其是落到无一人可说话的地方，稠众而无人理会，应当更为痛苦。可是徐志摩感觉不同：“我在康桥的日子，可真幸福，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，一个人就变气息，脱凡胎。”

为什么1922年的剑桥，与1921年大不一样？我个人觉得，这与徐志摩交游洋人的本领，有相似的心理因素：他是个完全没有自卑心理的人。面对西方最骄傲的文化人，积极进取，不顾对方脸色；面对最孤独最失败的境遇时，寻找“发现”，为自己制造神话。徐志摩浪漫热烈，逆战获胜，而你我俗流坐而叹息，一无所成。笔者住伦敦，把来访的中国文人带到剑桥去“看徐志摩”，成为每年必有一二次的义务。